

## 民族历史与时代精神

张锦胎

——读长篇小说《三娘子的五色草原》

作家赵耀东新近创作的长篇小说《三娘子的五色草原》，是一部集儿女情长、民族交融、宗教信仰、国家统一于一体的奇异之作。作品着重表现明代蒙古瓦剌奇喇古特部哲恒阿噶之女三娘子（钟金哈屯）在北疆草原主政30年间的功绩，但令人记住的还有那一时代分散的蒙古各部落逐渐统一、土默特地区蒙汉杂居农耕并举逐渐形成的现实，并由此想到作品背后的历史。史诗性与传奇性兼具。

难能可贵的是，在如今网络上、荧影视剧中戏说、穿越流行之际，这部小说不随波逐流，坚持“正说”，整部作品中大的历史背景都很真实，力求达到一种真实史实与好看故事的完美结合。而作家又不为史实所拘泥，在情节的钩织铺展中，诸条线索齐头并进，有对少女钟金美丽轻灵、草场放牧的细腻描述，也有对她救护藏僧阿兴以及先后被扎拉图、阿拉坦汗塔搭的紧张描写；有对钟金哈屯学画画、写汉字、进县城、见朝吏的有声有色的描绘，更有对她被亲切地称为“三娘子”以及在孙子巴汉那吉投奔明朝后促成蒙汉通贡和互市的有张有弛的描叙。简练而丰富，简洁而深切。丰富的民族文化意蕴与深切的时代精神内涵尽在其中。

明朝紧接着元朝。蒙汉民族的团结、蒙汉关系的发展都极其重要。历史小说虽是文艺作品，写作时依然需要客观、理性。这部作品对当时草原民族的生存状态、蒙汉上层之间的反复征战、宗教界内部的争斗、百姓中的友善相处等等都有所展现，厚实的内容与超拔的想象相结合，使作品质地厚重而又气息灵动、深度与广度兼顾，也很难得。文学即人学。长篇小说比其他文体更重人物刻画。这部作品，三娘子以外，出场人物有三十几个，主要人物也有十多人。这些人血肉丰满，各具光彩。如阿拉坦汗的威严、聪睿，一克哈屯的高贵、智慧，阿兴喇嘛的安静、淡然，巴汉那吉的孤僻、执拗等等，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但，作品不仅仅写出人物个性，而是力求揭示人与人之间的微妙、复杂的关系，注重细节与人物心灵的呈现、命运的发展。整部作品，写历史事件更写人物内心，写争斗更写人性，表露出一种独特的视角与眼光，透露着一种异地的地域氛围与生活气息。

小说语言优美隽永，昂扬超脱，且富于哲理，简简单单一句话，常常直指人心，令人怦然心动。如阿兴喇嘛与阿哈谈“刀”，说：“利器皆是外物，主宰它的不是刀本身，而是在于人”；钟金说阿拉坦汗：“狮子六十岁也是狮子，羊再年轻还是羊。”阿拉坦汗说自己的孙子：“男孩长大了就是带犄角的牛，随时会把你的顶翻在地。”等等。每一句话都渗透了生活情感的汁液，更凸显作品鲜明的民族性、地域性。

显然，这部小说是一次精心的艺术创造。

## 家园之思 生命之梦

□刘上洋

决、刚毅而决然，给人以阳光、气概和力量。她的几本小说已经或正在拍摄成电视剧，尤其是长篇小说《红翻天》，通过展示一段激情燃烧的历史，演绎一幕慷慨悲壮的大剧，从而荣获2009年度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和第七届“中国人民解放军图书奖”，这也同样说明了这位女作家情愫中蕴藏了另外的一面。

散文之创作，在于勤，在于恒。近年来，温燕霞一边工作，一边创作，不断有新作问世，特别是很多作品能够得到广大读者的认可和共鸣，实属不易。这本文化散文，更是把源远流长的客家文化和习俗容纳其中，需要更深的文化积淀和功力，其在价值也远在一般的散文作品之上。希望作者再接再厉，在这充满阳光雨露的春天里，写出更多更好反映时代精神、彰显生命活力、弘扬人性之美的精品力作，为散文百花园增添更加绚丽、更加迷人的色彩。

么不带他去深圳上学?为什么对自己的妻子动不动就恶语相加、对杨水仙却笑脸相迎柔情似水?为什么母亲在电话中总是向自己哭诉着父亲的不是,可是面对父亲时却唯唯诺诺?还有爷爷和奶奶为什么对自己好起来的时候是百依百顺,不好的时候却是棍棒相加?小满的妈妈明明不喜欢阿松叔叔,为什么却要跟他结婚?妈妈到底有没有从事那种让她丢脸的行业?苦娃为什么会被父母遗弃?另一方面,温燕霞则通过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对比,让城市儿童拥有的完整家庭生活和亲情关爱状态下的生存状态和心理成长,来反衬农村留守儿童所遭遇的亲情和家教双层缺失给这些幼小心灵带来的损害。为此,她设计了南瓜和小满走进城市儿童贝贝的家。而这个家,与农村儿童的家庭比起来,有着天壤之别。这种区别,不仅仅是贝贝所说的“爸爸妈妈每天逼着她吃鸡蛋、喝牛奶,下课以后让她学奥数、弹钢琴,星期六学画画,星期天上午上小星星英语班,星期天下午练舞蹈”,最重要的是,在这个家庭里,贝贝能够接受到完整的家庭教育,享受到完整的亲情关爱。

正是通过孩子对成年人社会这一系列现象的追问,通过儿童成长与成年人生活的交叉性叙述和乡村与城市家庭的交错表达的叙事方式,《半天云》充分挖掘和展示了在社会转型和城市化进程中,农村留守儿童身体上、精神上、道德上、情感上遭遇到的问题和危机,并通过这些问题和危机,深刻揭示了我们这个社会存在的种种令人担忧的现象和所面临的危机,以及它们可能对未来中国发展带来的深远而又巨大的不良影响。

## 家园之思 生命之梦

——读温燕霞散文集《客家·我家》

对采茶戏、围屋、祠堂，甚至精美的客家小吃的描述，我们也能从那些摇曳生姿、趣味盎然的笔墨中，感受到作者浓浓的客家人情和对客家历史文化深深的挚爱。

好的散文，还要有独特的风格，这也是散文的魅力之所在。作为女性的温燕霞，她的散文既浪漫温情、细腻精致，又热情奔放、恢弘磅礴。比如《母亲》《井头婆婆》《蓝色花》《金丝黄》等，让人品味客家人独有的坚贞和美艳；《风花有关雪月》《沉醉的事物》《女人N话题》等篇章，展现了客家女性的内心世界与情感经历，笔下的桃花、水仙、青梅、茉莉、丁香乃至箫声、雨声、山光潭影、飞鸟流泉，都是那样幽雅细腻、精微缠绵、温情清丽，客家人独有的敏感、浪漫、柔婉、娴静、贤淑、迷离、梦幻等，不经意就从她的散文中流露出来。而《北望长城》等篇章，却是那样的热情奔放、激扬豪壮、恢弘阔大，语言中透露的铿锵而果

## 智性灵光与理性深度

——谈小说《半天云》与留守儿童

□曾学优

年时光,但是,她自幼在赣南客家农村山村长大的生活经验,以及山村诗意一般的童年场景,毕竟还是为她的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使得《半天云》与其他同类作品相比,塑造出来的儿童形象更加充满智性的灵光。虎军作为《半天云》的小主人公,可以说充满了儿童文学中的人物所具有的“幽默感、智慧、思想、诗性”。虽然他也有着其他农村留守儿童应有的人物性格,比如说隔代教育带来的狂妄自大、亲情缺失带来的内心孤独等,但是,在温燕霞的笔下,我们看到的更是一个乐观、自信、勇敢、有着正义感而且充满智慧的儿童形象。他在大年初二那天父亲开车离家时导演的小伙伴们披麻戴孝哭丧闹剧,他为了报复父亲包养的二奶杨水仙而购买五个手机,组织五个同伴每天发十条信息,用世界上最恶毒的言语咒骂的无聊行为,他为了叫醒因迷信而在床上等死的南瓜的奶奶十五婆,而组织同伴们表演的智激十五婆的鬼把戏,他为了替父亲还债而向丐哥借了1万元亲自送到深圳的父母手中的孝顺之举等等,这一切都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与其他同类题材文学作品中完全不同的农村留守儿童形象。他机智勇敢、充满爱心、阳光帅气,在他身上,没有早恋、没有心理扭曲,也没有吸毒等不良的行为——而这几乎是曾经的文学作品中农村留守

儿童的形象标签了。

其实,不光是虎军,温燕霞塑造的围绕在虎军身边的那一群农村留守儿童,苦娃、南瓜、多多、梦园、小满、梦美,甚至是小牛哥和阿媚姐,在他们身上固然有着种种不良习性,比如小牛哥和阿媚姐的贪图享受、不求上进,比如多多的喜欢占小便宜、见钱眼开,比如小满的好吃懒做,比如梦园的迷信思想,比如南瓜的胆小怕事等,但是,从整体上来看,他们却是一群活泼可爱、充满智性灵光的少年。无论是小牛哥为救虎军的挺身而出、挡了大炮一刀而不幸遇难,还是憨南瓜不计捉迷逃,又或者是小满在父亲坟前对母亲有没有做那种不光彩事情的质问,再或者是梦园对四个想跳塔妹子的机智挽救,温燕霞对这些农村留守儿童充满智性灵光的书写,让我们感受到了儿童文学所特有的诗性和丰富的想象力。

当然,作为一部反映农村留守儿童生存状态的长篇小说,温燕霞并没有忘记其创作的主题和真正使命。家庭是社会的细胞,而儿童又是祖国的花朵和未来,农村留守儿童的成长关乎着中国未来的发展。因此,在《半天云》中,一方面,温燕霞把农村家庭作为解剖单位,从孩子的视角,通过追问成年人家庭成员,来追问整个社会所存在的问题。比如虎军对父亲王有财为什

## 旧体诗词回归与新江西诗派兴起

——郑伯权、蔡起兴的旧体诗词及其他

□李天郊 凌翼

蕴藉,真美深厚,不历经世事纷纭、沧桑变幻,是无法如此“手到诗来”的。“景山风雨漫无愁,长城自毁车马休。遍地烽烟何所见,白练三尺挂柱头。”(郑伯权《景山怀古吊明思宗》)诗人以庄重的笔调,将一页历史画图高挂长空,让读者遐想良多。再如:“佳人楼上唱离歌,唤得郎君快渡河,卷起珠帘放眼望,残山剩水已无多。”(郑伯权《秦淮故事诗》)诗人又以诙谐轻松的描绘,将一折秦淮历史故事戏,跃然纸上,言微旨远,扑朔迷离,让人啼笑皆非。

改革开放时,郑伯权写了诸多赞美诗,如歌唱较早“敞开城门”的武汉:“肇启四门建大业,开放三镇拔头筹。常思五马棠荫下,心系东湖明月舟。”(郑伯权《秋风一叶》)又咏岭南新貌:“一江两岸起宏图,无限风光景物殊。南水高楼多插柳,湖潮荷叶雨抛珠。吴头楚尾今胜昔,尧日舜天总不忘。王勃归来寻旧迹,路人指点说洪都。”(郑伯权《洪都新咏二首》)诗人的喜怒哀乐是同祖国命运的盛衰起伏相呼应的,国衰心忧,国盛心欢。

郑伯权一生不求官职,坦承有自知之明,无意仕途。他在《人日答友人问》中是这样婉拒官场的:“独对孤灯一病身,管他风雨管他晴。年年桃树换新种,岁岁新酒装旧瓶。篱下每思闲菊句,临溪绝少羡鱼情。不知魏晋世家事,我本桃花洞里人。”他留恋的是:“齿寒犹食国家粟,人老难忘老叶村。宠辱不惊聊自慰,俯仰无愧对亲朋。”(郑伯权《六十二初度》)但他和杜甫一样,愿“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望官员都如尧舜,让天下幸福太平。

郑伯权的诗有着强烈的人本情怀和忧患意识。他对儿时好友写道:“风雨匝床夜竟晓,两窗剪烛月待圆。数名山贼无颜,我少粟耕种回田。”(《悼亡友吴文鼎》)同窗厚谊,情如手足,他又为其怀才未遇而不胜感慨:“顾我多情怜醉客,感君意气似飞鸿。画堂空有陈蕃榻,江右已无匡士风。”(《柘园夜话》)无奈南君有名的陈蕃榻,如今只能在画堂见到。他与世无争,“红烛灯前泥一醉,风尘帐里起彷徨。自知天意高难问,羞向人间说炎黄。”(《寄友人》)

## 二

病卧在身的郑伯权,对诗词的热情却从未减退。有心寻觅江西民间旧体诗作的他,像古董收藏家寻宝一样,多少年来,执著地在地下发掘“诗宝”,他早已注意到“五四”时期,旧体诗词已被断了后路,陈独秀绝对化地断言“必不容反对者有任何讨论之余地”,其时连叶圣陶也表态绝不写旧体诗。可是到了抗战时期,块垒要吐,诗愤要发,新诗形式满足了文人墨客的倾诉,新诗的积极实践者闻一多突然呼号“勒马回缰写旧诗”,旧体诗又重返诗坛,为民族救亡焕发勃勃生机。叶圣陶转身一口气写了几十首旧体诗,被人称为“绝唱”。

今日,郑伯权笔下又燃起了旧体诗的热情。他决心把流传江西民间的旧体诗词挖掘出来,要以江西诗派的气节,以“淡泊名利”的人品和诗品,以“诗须有为而发”和师法前人、点石成金的

要旨,以诗的意境风格、韵味、体式 and 审美情趣为

追求,扎实、沉稳地把江西近几十年的旧体诗词文献整理出来。具体而言,他要以《新江西诗派谈诗》为总题,分别选评旧体诗经典,以专集或合集形式,逐年正式出版发行。这一活动的主人包括古往今来出生于江西、或生活工作于江西的诗人。围绕这一主张而形成的群体,主要活动是旧体诗词的创作和整理。这是一个广泛的无须组织和构建具体纲领的文学群体,惟旨继承历史上的江西诗派传统,振兴江西诗词。这便是新江西诗派兴起之端倪。

新江西诗派,于诗歌总体而言,是旧体诗的一个流派;于旧体诗词而言,是一个旨在继承宋代江西诗派风格的旧体诗流派。继承不是泥古不化,诗词守护旧体诗格律,而内容不被形式束缚,师法古人也师法自然;诗韵以水平韵类为准,也不排挤现代诗韵。郑伯权愿以发起人身份,担当《新江西诗派谈诗》总起权;以其才华和胆识,尽其有生之年,倾其物质和人力资源,实现新江西诗派兴起之愿望。

江西古称“诗歌之乡”,这称呼不是凭空而来的。粗略估计,凡有集子问世,包括从史传中见到诗集名的,历代江西诗人约有200余人,几百首诗;被收录于《全唐诗》《唐诗纪事》《宋词钞》《元诗选》《历代诗余》《词综》《明词综》及《历朝“诗别裁”》等书中,就有五六百名江西诗人和万余首诗。江西诗人诗作产生多的原因,除了大气磅礴尚诗作以及当时的地方经济发展、阶级关系等原因外,诗歌流派的形成以及诗人人脉关系间的相互鼓动,也是一个重要因素。黄庭坚之学韩愈而创立“江西诗派”,就是这样囊括赣江两岸诗才,使流风遗韵不断扩展,“先河后海,其渊源自有自也”(引自《四库全书总目》),起到了凝聚诗人诗作的作用。

自晋至唐诗在江西属落蕾初开,虽只陶渊明花开一朵,却在全国首屈一指;至两宋江西诗词可谓百花竞艳,晏殊、欧阳修、王安石、黄庭坚、杨万里,香遍全国,尤其王安石,政治改革让后人毁誉参半,诗歌创作却全国赞誉;至元全国诗坛衰落,江西晚花犹香;至明清,江西诗词业已衰落,只剩少许诗人佳作,袅袅余香;至近代江西只个别诗人“借取东湖八百里,肆吾十万水犀军”(文廷式诗),唱出了几句忧国忧民的豪言壮语,在全国有回响;至当代,自清末民初陈三立首倡赣派同光体以来,江西的旧体诗有影响的诗人,就叫不出大名了。这就要靠我们这一辈的努力,这就是我们冀求创立新江西诗派的恩惠初衷。旧体诗词的回归和新江西诗派的兴起,将给江西文化发展带来历史性的新气象。

2012年春节前夕,郑伯权在朋友处发现蔡起兴的《乐中集》手抄本。他一口气读完了蔡起兴的诗,不禁泪湿青衫。他觉得蔡起兴就是新江西诗派的宗师。他被这位素昧平生、生于浙江而葬在江西的诗人感动了。他凝视着集中杂草丛生的“蔡起兴老师之墓”照片,像见到久别重逢的知己,挥笔写下《蔡起兴先生二十周年祭》二首,诗曰:“读罢遗编泪潸然,先贤敬拜恨无缘。青山幸

有诗魂在,一瓣心香祭奠日。”“野草坟头起暮烟,泪罗赣水递相连。问天难对人间事,挂剑迟来二十年。”

殊不知,郑伯权的《蔡起兴先生二十周年祭》,霎时间插翅飞向了江西诗词界。一唱众和,络绎不绝的“和诗”寄至郑伯权处,人们四处寻觅着蔡起兴的诗。《乐中集》只是手抄本式的印刷品。郑伯权毅然决定自己掏钱,联系出版社正规出版蔡起兴的全部诗作。

## 三

最近,由郑伯权个人资助正式出版的《蔡起兴诗文校笺》(龚联寿等校笺,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问世了。蔡起兴的诗将个人遭遇与国家民族命运连在一起,酣歌畅饮,志存高远,气韵慷慨,别具一格。

蔡起兴(1920-1991),原名岫青,字乐中。年少时就聪颖好诗,“独步荒郊外,凌寒未肯回。踏来三寸雪,寻得一枝梅。”(蔡起兴《踏雪寻梅》)他11岁写的诗就心净似雪,志向寒梅。后在清华大学国学专修院毕业,弱冠之年有了个人诗集出版。不想学成归来,国难当头,他在《二十述怀有序》中写道:“余初度之辰,适寇寇侵占故乡之日,三载铁蹄,一片焦土,河山破碎,骨肉流离,痛心疾首,宁有是耶?闻华亭之唳鹤,羨越石之闻鸡,投笔从戎,渐深知远,请缨弱冠,愿学终军。感赋四律,自非无病之呻吟,聊抒同仇之义愤。”爱国仇敌之情怀,溢于言表。诗云:“劫历华严愧夙心,欲抛黄卷易龙吟。伤心荆棘三千里,回首蓬菜二十年。后起漫夸江氏笔,前程猛策祖生鞭。算来一事输人处,不向朱门浪拍肩。”诗里写的是诗人的“述怀”,反映的却是那时代“痛心疾首”的困难,是民族的忧虑和悲情,也是一代爱国青年的共同心声。从此这位清华高材生,自知前程是挥策祖鞭,不向朱门,而面对镰锤,投身抗战。

虽说投笔从戎,那年初次写诗的手却一刻也没离身。“谁说中华事已沦,暴风雨下更无人。将军百战终亡狄,壮士千秋不带秦。天下岂难三箭定,五师应见九州平。拼他多少男儿血,化作黄河一洗新。”(蔡起兴《台儿庄大捷》)诗以完美之艺术才力,将历史与现实融为一体,用典切贴,古为今用,高扬抗战必胜的志气。今日读来,仍可见其人,如闻其声。“濠濮闲情嘲逝水,兴亡有愧愧前贤。”(蔡起兴《宾至》)“金犹可买非奇货,剑不能降是巨鳌。拼将楼兰争一死,哀鸿何必尽情号。”诗歌真切地记录了那悲愤的亡国之恨和中华民族同仇敌忾、破釜沉舟、一无所有的抗战决心。“定教直捣黄龙,借作悬孤饮更醒。”“安得化身为木石,填平东海救冤禽。”(蔡起兴《二十述怀有序》)终然是青春豪气,诗洒剑胆,直冲霄汉,赤心报国,视死如归,那带血的诗箭,确可御敌千里之外。

“推蓬一望墨无涯,国破何心恋物华。佛子空堂生蔓草,英雄坟老落梅花。巍巍石碣干云立,隐隐风帆入远矧。俯仰忠魂犹不起,残阳影里噪寒鸦。”(蔡起兴《风雨同舟行碧浪潮望陈英士先烈墓有感》)这与杜甫的“国破山河在”异曲同工,纵有铁石心肠之人,读到此间能泪?这

目前,中国当代旧体诗词创作异军突起,越来越引起文学界的关注。看似已沉寂于现当代文学历史中的旧体诗词,已昂首阔步地回归于新世纪中国文学界。“旧体诗词将肯定不会以少数人的意志为转移而继续缺席中国现当代文学历史现场了。”(李遇春《如何看待当代旧体诗词创作》)

其实,虽说60年来,旧体诗词在社会上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但“真诗在民间”,颠沛流离于国内的诗词奇葩,却没有间断地开花结果。因其无地位而风雨漂泊,却在规避风险中,更显智慧与才华;因其“潜伏”地下,朝不保夕,却更具精神意志和生命力。

江西是孕育美诗的美丽故土,不胜枚举的江西诗人,像璀璨的繁星闪烁在中国文学史的上空。且不说陶渊明、欧阳修、王安石,单说史上有名的江西诗派,从宋至元近200年间,从黄庭坚到曾几、杨万里、朱熹、刘辰翁,直到提倡宋诗创立“同光体”的近代陈三立,江西诗派的余韵,对江西诗坛影响经久不衰。在旧体诗举步维艰时,江西民间一些崇尚气节的诗人,仍在继承江西诗派遗风,诗词唱和,相互鼓励,不落窠臼地唱出一些别有风韵的诗。这些诗和诗人近年来渐露峥嵘。当下有识之士,决心继承江西诗派,以新江西诗派之气魄,挖掘和整理近几十年来自江西旧体诗词之精华,爰赋此文试为评述与介绍。

## 一

2010年年底,郑伯权《秋风一叶》出版(作家出版社),《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家文章《秋风一叶 满纸苍生》,写道:“作者自谓‘七十三岁,一介布衣,差差可陈’。‘书中历历可见当年一位十七八岁的少年,像一叶新荷,崭露头角。1959年,20多岁的郑伯权便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四五十行的新诗《一根牛鞭子》,一声鞭响惊天。诗歌记载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农民的幸福生活。”从此,作者以笔为鞭,在文坛耕耘。“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是他写作的信条,笔下耕耘的却是理想、智慧和志气。

郑伯权,生于临川才子之乡金溪,大学毕业后当记者,做编辑、任编审,“文革”前诗声远迹,被称为新中国的第二梯队诗人。他亲历了“文革”的动荡,也感受到了改革开放的喜悦,他既写新诗,也写旧体诗,他的新诗曾一鸣惊人,旧体诗得进,但多有流失,直到73岁时,才将留存下来的旧体诗,收进《秋风一叶》诗集中。

诗人血气方刚之时,“文革”中断了他正在收获成果的文学之路。但他仍然以笔为诗,表达出的则是复杂的、关切时事的忧国之心。郑伯权的旧体诗词,内容丰富,高致深峻,别具一格;古韵铿锵,格律严谨,对仗得体,用典入微;诗言志,坦露的是真性情,宁静坚实。

他的诗师法杜甫,注重现实,沉郁顿挫,感时抚事,激荡衷肠。在忧叹着“风声雨声读书声”时,关心着“家事国事天下事”,比如:“长城内外苍苍走,走石飞沙接大荒。塞草应怜应白骨,塞关收拾断头枪。”(郑伯权《长城怀古》)诗人不着重叹一字,却把思想情感和意识融化在诗境中,让读者去感受、去想象、去深化。这种寓主观于客观的写作手法,是学杜甫的。又如,“白云流水绕双清,这是进京第一程。政息楼空人去后,满山松子落秋声。”(郑伯权《题香山双清别墅》)诗人忧叹的是什么呢?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这种对现实景物典型的艺术概括,生发出哲理思考的手法,风神

潇洒,真美深厚,不历经世事纷纭、沧桑变幻,是无法如此“手到诗来”的。“景山风雨漫无愁,长城自毁车马休。遍地烽烟何所见,白练三尺挂柱头。”(郑伯权《景山怀古吊明思宗》)诗人以庄重的笔调,将一页历史画图高挂长空,让读者遐想良多。再如:“佳人楼上唱离歌,唤得郎君快渡河,卷起珠帘放眼望,残山剩水已无多。”(郑伯权《秦淮故事诗》)诗人又以诙谐轻松的描绘,将一折秦淮历史故事戏,跃然纸上,言微旨远,扑朔迷离,让人啼笑皆非。

改革开放时,郑伯权写了诸多赞美诗,如歌唱较早“敞开城门”的武汉:“肇启四门建大业,开放三镇拔头筹。常思五马棠荫下,心系东湖明月舟。”(郑伯权《秋风一叶》)又咏岭南新貌:“一江两岸起宏图,无限风光景物殊。南水高楼多插柳,湖潮荷叶雨抛珠。吴头楚尾今胜昔,尧日舜天总不忘。王勃归来寻旧迹,路人指点说洪都。”(郑伯权《洪都新咏二首》)诗人的喜怒哀乐是同祖国命运的盛衰起伏相呼应的,国衰心忧,国盛心欢。

郑伯权一生不求官职,坦承有自知之明,无意仕途。他在《人日答友人问》中是这样婉拒官场的:“独对孤灯一病身,管他风雨管他晴。年年桃树换新种,岁岁新酒装旧瓶。篱下每思闲菊句,临溪绝少羡鱼情。不知魏晋世家事,我本桃花洞里人。”他留恋的是:“齿寒犹食国家粟,人老难忘老叶村。宠辱不惊聊自慰,俯仰无愧对亲朋。”(郑伯权《六十二初度》)但他和杜甫一样,愿“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望官员都如尧舜,让天下幸福太平。

郑伯权的诗有着强烈的人本情怀和忧患意识。他对儿时好友写道:“风雨匝床夜竟晓,两窗剪烛月待圆。数名山贼无颜,我少粟耕种回田。”(《悼亡友吴文鼎》)同窗厚谊,情如手足,他又为其怀才未遇而不胜感慨:“顾我多情怜醉客,感君意气似飞鸿。画堂空有陈蕃榻,江右已无匡士风。”(《柘园夜话》)无奈南君有名的陈蕃榻,如今只能在画堂见到。他与世无争,“红烛灯前泥一醉,风尘帐里起彷徨。自知天意高难问,羞向人间说炎黄。”(《寄友人》)

病卧在身的郑伯权,对诗词的热情却从未减退。有心寻觅江西民间旧体诗作的他,像古董收藏家寻宝一样,多少年来,执著地在地下发掘“诗宝”,他早已注意到“五四”时期,旧体诗词已被断了后路,陈独秀绝对化地断言“必不容反对者有任何讨论之余地”,其时连叶圣陶也表态绝不写旧体诗。可是到了抗战时期,块垒要吐,诗愤要发,新诗形式满足了文人墨客的倾诉,新诗的积极实践者闻一多突然呼号“勒马回缰写旧诗”,旧体诗又重返诗坛,为民族救亡焕发勃勃生机。叶圣陶转身一口气写了几十首旧体诗,被人称为“绝唱”。

今日,郑伯权笔下又燃起了旧体诗的热情。他决心把流传江西民间的旧体诗词挖掘出来,要以江西诗派的气节,以“淡泊名利”的人品和诗品,以“诗须有为而发”和师法前人、点石成金的

是那个时代我们民族同抛的一掬滚滚热泪,至今也不冷却。这泪珠正如诗人转战回乡时所云,那是珍珠:“百转千回恋故巢,愧无情物慰知交,只留一把相思泪,当作珍珠不断抛。”(蔡起兴《百转二首》)诗人用血和泪凝聚的诗句把国家不幸的历史刻上青史,激励历经沧桑的民族发愤图强;字里行间,既写了民族之灾难,也展现出民族之曙光。这便是蔡起兴永恒的功德。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才华横溢、抱负远大的热血诗人,在其34岁血气方刚年纪,因“历史问题”获罪,开始了漫长的圜圜生涯。突如其来的打击并未使他失去理性,他淡定如一,仍以诗吟:“贵贱穷达理,无分气与古。惟其超物外,乃能齐甘苦。思洒浙江潮,梦闻铁窗锁。昨至讯问室,言语殊相左。始觉神黯然,楚囚竟是我。”(蔡起兴《甲午十一月歌咏长阳路一四七号》)此种凄婉哀怨之情,寄托的是辛酸无奈,神情黯然,诗人却仍能“超物外”,“齐甘苦”。古往今来,此情此景人间难得寻觅。

此后的三十四年光阴,诗人便生活在人间的最低层。然而,他的精神却最富有,“家国沧桑,罹忧莫解,轻尘短梦,荡气回肠。”(蔡起兴《洛舍留别诗有序》)支撑着蔡起兴漫长缱绻生命的便是为诗,为诗成了他命运多舛的安身立命之本。有形无形的笔杆心语诗笺,他一刻也没或缺过。“一肩行李一吟身,且向风尘问苦辛。”(蔡起兴《一肩》)他历经了“镇反”、“反右”、“文革”重重劫波,从牢狱出来,或种地、或拉力,很久没有离开劳改农场。他把诗的腹稿,埋在肚里,刻在心底,抄写隐藏,秘而不宣。多少年惟一的读者是自己。“苍凉吟暮雨,灿烂忆阳春。”(蔡起兴《赠程祖光》)“豪气诗魂终古在,海天万里乘长风。”(蔡起兴《戊戌除夕望海》)她始终没有对生活绝望,“莫愁双手冻,能庇万家寒。”(蔡起兴《棉花词》)

受尽苦难的诗人留在农场教书,已近晚年,他惭愧自己,关心的却是学生:“大海浮沉六十年,俯身风雨浪无边。苍凉明月还珠恨,荏苒闲云愧瓦全。放眼休论成与败,关心最是后超前。桑榆犹恋斜阳影,珍惜东篱向晚天。”(蔡起兴《已未十一月十九日初十夜作于成新乡中》)

七十初度,诗人已感心力交瘁,仍乐观有余:“甲午十月,身陷囹圄,年三十有五,虽从容自如,然决不愿意尚能三十五年未死,念古人班六十、苏六十五、李六十二、杜五十九……都无此寿,回首前尘,真乎梦乎,爰赋小诗,自挽乎?自寿乎?(蔡起兴《七十初度有赋》)谁知一语成谶,这首竟成了他的自挽诗。弥留之际,他把一沓沓发黄的香烟纸袋和仅有的遗产1000元现金,交给朋友。香烟纸袋写满了他的旧体诗100余首,他托朋友把诗印成集子。

“生抛裘马能长乐,死有文章不算空。”这是诗人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也是他积极的人生观。他一生追求的不是裘马,而是“文章”,一生成就在一吟中,他嗜诗如命,别人不敢写时,他用生命偷着写,一生缱绻,是戴着双重镣铐跳舞为诗。诗就是诗人的灵魂,因其诗魂不死,诗在诗人永在,虽九死犹其不灭。

有诗云:“寻梅踏雪缘无路,剩有一吟不示穷。反逼奇穷困圆梦,孤平拗救楚囚笼。踟蹰镣铐缠身舞,韵味铿锵落地融。寒雁一霄千古唳,诗声人后九丘虹。”(李春林《读蔡起兴》)